



红军

王夢岩著

女 紅 軍

王 梦 岩 著

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· 一九五九年 · 西安

內 容 大 要

本書包括五篇革命斗争故事。其中一篇是紅軍长征途中的故事，兩篇是湘鄂贛苏区老革命根据地的故事，还有兩篇是描写东北淪陷期間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活动。在这几篇作品中，作者塑造了几个鮮明的富有时代色彩的革命妇女的形象。她們崇高的革命品質，能使讀者受到深刻的教育。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09 号)

西安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4 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陝西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· 1 $\frac{11}{16}$ 印张 · 28,750 字

1960 年 1 月第 1 版 196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,000 定价：(5)一角三分

統一書号：10147·110

目 次

永远忘不了的人.....	(1)
华亭.....	(11)
女红军.....	(24)
女儿.....	(33)
在敌人心脏里.....	(40)

永远忘不了的人

“一个人在一生中，总是要经历许多事情，但是能够在记忆中永生不忘的，却也只有几件。”

刘处长最近常常讲起这几句话，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总体体会不深。一天下午，他跟我们谈了下面这个故事。

去年冬末的一个晚上，部里的公务员给我送来一包不大的印刷品，圆圆的邮戳上印着“湖南浏阳”四个字。这真有点奇怪了，浏阳虽是我的故乡，但是父母早已去世，那里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多少年来从没有人给我写过信，更不要说寄东西了。解开邮包看了信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我的一本旧日记，里面还附着一封不相识的人写来的信。信上说：他们最近翻修房子，在我母亲过去住过的房子的搁楼上，发现了一本早年留下的破本子，他们拍掉一寸多厚的尘土，在虫吃鼠咬、残缺不全的小本子上，翻来复去看了好半天，也猜了好半天，才从模糊的字迹里，隐隐约约看到我的名字。他们查了很多年前的户口，又打听了许多人，才证实确实是我的东西，于是就把这残缺不全的小本子给我寄来了。

說來話長，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間的事。當我臨離開湘鄂贛蘇區的時候，曾把許多文件留在家里，其中就有這個小本子。後來母親寫信告訴我，敵人“圍剿”得緊，年月不太平，文件都燒了。這本日記是母親忘了燒，還是故意替我保存的，就無法考查了。因為我母親早在一九四四年，就被國民黨殺害了。

自從有了這個小本子，我每天下班之後，就聚精會神地翻閱着，腦子里浮起了二十幾年前戰鬥生活的情景，多少個夜晚都不能安靜睡覺。

翻開了第一頁，短短的幾行字跳到我的眼里：“今天行軍七十里，沒有戰鬥……”第二頁：“今天打了個勝仗，捉了兩個大土豪……”關於行軍打仗的記事，就是這樣簡單，沒有一點多余的話。

在那戰鬥頻繁的年代，除了行軍打仗，也的確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了。

一天夜里，我正靜靜地讀日記，突然幾行歪歪斜斜的小字跳到我的眼里：“在舊社會里，她受人欺負，後來參加了紅軍，她很勇敢，活象個男人。她犧牲了。”

我哭了。這是小英子呀！為什麼當時不多寫幾筆呢？可也難怪，當時戰鬥頻繁，那有充裕的時間把她犧牲的事原原本本地記下來呢？

小英子，她是我終生難忘的人，對於她，就是這簡單的只字片語，也足以勾起清晰的回憶——

小英子是我们医院的护士班长，那年她刚十九岁，参加红军只有一年多。她脸上从未有过愁容，整天甩着两根辫子，穿着肥大的灰军服，不是照顾伤病员，就是洗衣、做饭。她那长长的黑鬓角，一直垂到耳朵的下端，脸颊红得像个苹果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间，国民党对湘鄂赣苏区进行了第四次“围剿”。敌人采取了封锁红军的政策，步步为营，在苏区的周围修筑碉堡，想把苏区的人民困死，饿死。没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十来个县的苏区，便只剩下五个村镇了。穿衣，吃饭，医药等都成了问题，特别是吃盐，就更成了大问题。没有“围剿”的时期，还常有小贩来卖盐；现在呢，这些僻静的山村里，连个小贩的影儿也见不着，他们都被白军封锁在苏区以外了。

怎么办呢？只好挖土盐，解决部队吃盐的问题。自从医院提出这个任务以后，天不亮小英子就起床，带着护士班，下地找盐；她们，三三五五在大地上——一锹、一镐地挖，象找金子那样的难哪！一天只能找到一小袋，可是，一小袋土盐放在锅里一熬，也就剩不多了。说起土盐来，那可真难吃，盐水是紫黑色的，吃到嘴里又苦又涩，象嚼着颗颗砂粒。尽管难吃，伤病员还是满心欢喜，有盐水，总比吃淡菜好得多，起码头不昏，眼不花，不反胃，不吐酸水。可是土盐那有那么多呀！那里能供得上几百伤病员吃呢？不到半个月，附近再也挖不出一一点盐了。处境

越来越困难，医院下了一道命令：“仓库存的土盐给伤病员吃，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动用。”因为缺少盐吃，同志们都象生了病一样，整天没有精神。

小英子脸上的红润也渐渐消失了，变得象黄蜡一样。一天晚上，她突然跑来，愁眉苦脸地告诉我：“指导员，朱政委又昏倒了。”说着流下了眼泪，又为难地说：“你看怎么办？这样下去不行啊！伤病员会拖垮的。”

我一边安慰小英子，一边想，是呀！伤病员昏倒的已经不少，难道让困难把我们压倒吗？我一抬头，又看到小英子用两手揉着眼睛，用不着问，她准是害了夜盲症。

这个素来精神饱满的姑娘，现在没有了笑容，呆立在那儿望着我，等待接受领导交给的任务。这些日子，她白天和大家一起抬伤员，晚上又照顾他们到深夜，别人睡下了，她还要洗纱布，准备明天医疗器具。由于过度疲劳，她的眼窝深陷下去了，加上没有盐吃，脸上起了一团团的黑斑，白眼球也出现了一条条的血丝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她总是艰难地紧锁着眉头，当她望见同志们没有血色的脸时，她便马上舒展开眉头，先嚥下第一口饭说：“同志们！你们看，快点嚥就能嚥下去。”

“不能这样！要打出去，向敌人要盐。”我不断地盘算着，如果能够让游击小组摸到敌人的圈子里，找到敌人的仓库，一定会有盐。没有领路的咋办？对，可以让小英子去！她家不就住在这儿附近吗？如果能够搞几袋子盐回

来，把它化成淡淡的盐水，每顿饭放上一點，就可以使伤病員的身体快点好起来，想着想着，我猛地抬起头来問道：

“英子同志，你家离这儿多远？”

“十多里。”英子抬起头来回答。

“咱們能找到敌人的仓库就好了！”

“这，叫我想想看。哎，有办法，离这儿五里路的地方，有我一个远房大媽，找到她就可以打听到敌人的仓库在那儿。”小英子大概猜到了我的用意，她高兴地問：“指導員，如果要打出去，让我带路好不好？”

“嗯！請示一下再說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有了盐，咱們的伤病員就都有了眼睛了！”她渾身是劲地說着。

我当时想，这一带地方她熟悉，带路是沒問題。可是她身体太弱，又害了夜盲，路上能否吃得消？但想来想去，現在沒有比她更适合的人，为了伤病員，为了几百人的生活，只好让她去，我想，路上多照顧她一些，可能問題不大。

領導上同意了我們出去搞盐的办法。当夜，天刚黑下来，我帶着小英子和另外兩個同志出发了。月亮照得大地通明，出門沒多远，就听见我身后“啊”的一声，回头一看，是小英子跌倒了。

她沒等我們三个人开口，一翻身爬起来就解釋：“没什么！在房子里呆得太久了，一出門眼睛有点花，是月亮照的。”

她把月亮兩個字說得特別重。說着，紧了紧腰上的那根皮带，揉了揉眼睛，把兩根辮子往八角帽里一塞，又跨到我們三个人前面来領路。我担心地紧跟在她的身后，看上去她真象个精干的小伙子，走起路来，一点声音都沒有。

我們繞过正面敌人的封鎖线，翻山越岭，走着羊腸小道，到了半夜时分，才接近敌人的据点。可是怎么也进不了圩子，敌人砲楼附近的游动哨，老是在圩子附近走来走去。我們伏在土崖后，抗着强劲的山风，等啊，等啊，一直沒有机会通过。我对小英子他們說：“別忙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！”不多一会，敌人哨兵轉过去了，趁这工夫，小英子灵巧地从一条壕沟一跃而过，她伏在地上轻轻地摆了摆手，我們三个人也迅速地爬过了砲楼。

这一带地方，那儿有水，那里有人家，小英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当她还是个少先队员的时候，就在这里放过哨，盘查路上的行人；后来扩紅的时候，她又在这儿参加过群众大会；慰劳紅軍时，她在这条路上送过軍鞋。这一切都是苏維埃政权成立不久的事儿。

我們四个人屏住呼吸，貼近地皮向前蠕動，八只眼睛瞧着側前方，突然又一个游动哨，出現在我們眼前。

我轻声說：“停住！”他們三个人就伏下不动了。

“快把他收拾掉！”李柱同志悄悄地跟我說。

“不能暴露，給敌人发现了我們就完不成任务了。”我說着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，留下小英子望风。我帶着

兩個人一個箭步跑上去，趁哨兵轉身的工夫，從背後把他攙倒，收拾了。於是，我們又快步通過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，走了一節子路，在一個房子旁邊停住了。小英子說：

“你們等等，大媽就住在這兒，我進去問問。”

“大媽，大媽，”小英子一邊扣門，一邊輕聲地叫着，房子里黑黑的，沒有一點聲音。她又叫了幾聲，才聽到有響動了，但沒有答話。呆了好一會兒，才出現了輕微的顫抖聲：“誰呀？”

“大媽，是我，我是小英子，快開門。”她咀對着門縫說。

門開了！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站在門里，正在扣左下襟的一個扣子；她兩腮塌陷，頭髮斑白，兩眼盯着小英子。一會兒，揉揉眼睛，才高興地叫：“英子！”

小英子捂住了大媽的咀說：“大媽，小點聲。”

“英子，你怎麼回來了？一年多不見你，看你瘦成這樣！”大媽咀唇顫抖着說：“自從這裡被白狗子占了，咱們的人……。”大媽摟住小英子直掉淚。

“大媽，別難過，這我們都知道，紅軍會回來的。”英子安慰着大媽，用手擦着大媽臉上的眼淚說道：“自從敵人‘圍剿’以來，我們的生活更困難了；現在最缺少的就是鹽。大媽，快告訴我，敵人倉庫在那兒？我們天亮以前就要把鹽搶到手趕回去呢。”

“听鄉蘇維埃主席說，過兩天就給你們送鹽去，現在

正在想办法呢。……噢，敌人仓库就在那个砲楼后边，有半里多路。”

“大媽！你保重啊，我走了。”

“英子，你等等。”大媽躊躇了一会儿，又叫住了小英子，轉身回到房里，拿出一包东西交给小英子說：“这个，給医院带去。你們都是为咱們穷人吃苦啊！告訴同志們，这是大媽的一点心意。”大媽深情地倚在門旁，望着我們的背影。

我們摸到敌人的仓库附近，先把哨兵解决了，进到黑咕隆咚的仓库里，找了好一会儿，才找到盐，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小英子用咀嚼了嚼，說：“找到盐了，找到盐了！”

多少天沒有看到这雪白雪白的宝贝了，誰都想抓一把放在嘴里嚼嚼，可是不能啊！一把盐能化很多淡盐水啊！

南方的七月天，晚上虽有强劲的风，但还是热得怕人。我們来时已经把衣服湿透了，回去每人肩上加上这一百来斤重的盐袋子，真有点吃不消。刚走了一段路，便滿身大汗。特别是小英子喘气的声音，隔几十步都听得見。我真是为难，不让她揩吧！她总是說：“我已经来了还能空着回去？指导員，让我揩吧，一百来斤盐可以解决很大的問題呀！”我只好依从她了，我們都咬牙坚持着。小英子累得汗直淌，已经迈不开步了，当我去扶她时，她还說：“指导員，我能揩，过了敌人的封鎖綫就好了。”

我們刚走过砲楼不远，东方就微微发白了，突然，我們背后枪声大作，糟了！敌人发觉了。走，快走！我把小英子那袋子盐也拿来放在自己肩上，小英子从我身上抽出手枪說：“你們快走，手枪給我。”我們三个人快步走着，小英子在后面和敌人边打边退。

敌人越逼越近，又是一陣密集的枪声向我們射来，我回头一看，小英子倒下了。她掙扎着爬起来，又倒下了。血染紅了她的衣服。她有气无力地說：“快把盐扛走，我来掩护你們。”她又把手枪頂上一粒子彈，坐得直直的。

我怎么能忍心留下她一个人呢？一定要設法把她揹回医院去。我一个箭步扑到小英子跟前，把她揹起就走，并告訴另外兩個同志，每人扛兩袋盐，在前边先走。敌人的子彈“嗖，嗖”地从我們頭頂飞过，我一边揹着小英子跑，一边射击着敌人，枪声越来越紧，敌人越来越多。我把小英子放下，猛地扔了兩棵手榴彈，敌人死伤了一些，有的伏在地上，有的向后退了几步，我又揹起小英子往前跑。

一会，我們前面又响起了枪声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使我出了一身冷汗：“怎么，前面又出現了敌人？”我把小英子放在隐蔽的山洼里，另外兩個同志把揹着的四袋子盐放在草丛中，我們三个人，一个人看守小英子，兩個人对付敌人。一切都准备停当，我們正計劃同敌人决斗，忽然小英子从山洼里爬出对我說：“指導員，給我兩個手榴彈，我还能战斗。”由于情况紧张，不允許我更多的考

慮，只好給了她兩個手榴彈。

追來的敵人向我們瘋狂地射擊。等敵人快到我們跟前時，小英子打出去第一顆手榴彈。敵人臥在地上不敢前進了。這時，在我們前面傳來喊聲：“小英子……小英子……”

趙院長的喊聲順着山風傳到我們的耳朵里，原來院長帶着部隊接我們來了。我們三個人幾乎要跳起來，只有小英子沒有喘聲，她安靜地躺在地上。

我們又打了一陣，敵人退回去了，等我們回到醫院，小英子已經停止了呼吸，我把大媽給的一包鹽遞給了趙院長，他頭也沒抬地接了過去。

“小英子，英子同志！”趙院長用顫抖的手擦着小英子身上的血跡。沉默了許久，脫下帽子說道：“她是個好同志，她的青春剛剛開始，人生道路在她前面還是那麼廣闊，她就倒下了，她為黨的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。”趙院長竭力壓制自己，把眼淚含在眼窩里。片刻，又昂起頭來，對我說：“告訴全醫院所有的同志，鹽是用鮮血換來的。”

1958年8月定稿

华 亭

今年“八一”是建軍三十周年，我們支部組織了一次革命故事报告会。报告人找好了，是我們干部司的薛副司长。平时我們都叫她薛媽媽。很少有人叫她“司长”。她那四十开外的年紀，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经历，慈母般的面容，和对人循循善誘的态度，使人一見就产生敬爱的心情。于是，就把她的名字和职称从咀边上抹掉了。

“八一”这一天终于等到了，我陪同薛媽媽一走进会场，同志們就站起来喊：“薛媽媽来了，薛媽媽来了！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，这样的会我还能不来？”薛媽媽扫視了一下大家說：“哟！看你們这些孩子，象欢迎什么客人似的，咱們来个‘圓桌会议’不是更随便点嗎？”

大家把凳子移到薛媽媽身旁坐定。

“你們要我讲什么？关于我自己，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，还是讲讲我那些战友吧。”薛媽媽喝了口水，瞧着大家說。停了一会儿，薛媽媽就开始讲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一段故事……

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长征后，江西就只留下部分紅軍和游击队了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上犹和崇义两县的许多村落都被白狗子占了，游击队也都上了山。我们那个游击队就在湘南一带活动。村镇上只留下少数地下工作人员，他们都是过去闹革命时的基本群众，和少数优秀的少先队员。

象坟头似的帐篷，搭在山沟里。这一年雨多，一会儿是牛毛细雨，一会儿又是暴雨。颗颗雨点打到帐篷上，水珠又顺着帐篷的缝隙滴在我们脸上，真是滴得人心烦。忽然一阵大风把帐篷上搭的被单吹跑了。寒风呼啸，人们紧缩成一团，冷得直打哆嗦。

一天夜晚，我听到远处帐篷里，有人时断时续地呻吟，进去一看，原来是我们的华亭同志。她那干瘦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身下铺着厚厚的树叶，旁边放着一盆冷水。她痛苦地紧皱着眉头，豆大的汗珠从两颊流下。突然，一阵冷风吹进来，她的头发飘动了一下，风带进来的雨点落了她一脸。华亭擦了一下脸，撩了一下头发，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嘴唇。

她快生产了，不能着凉啊！我赶忙跑回自己的帐篷，拿来一床打土豪时分来的夹被，送给华亭。

刚走到她身边，一抬头，看见她的丈夫吉星已回来了。他是我们游击队的小队长，他打仗挺勇敢。可是现在却束手无策，来回踏着碎步，焦急地摆弄着帽子。我心里也挺焦急，山下的村子被白狗子占着，上那儿去找接生的人？再说要找也已经来不及。我虽是一个女同志，可那时候还

年轻，也沒有結婚，一聽說生孩子就要臉紅，那里能下“狠心”幫助產婦接生呢？怎麼辦？我思忖了一會兒，還是下決心自己給華亭接生。我讓吉星把舊軍衣撕成尿布，吉星猶疑了一下，終究還是狠了狠心，把衣服“嗤”地撕破了。你們知道他為什麼猶疑嗎？因為這身軍裝還是中央紅軍長征時同志們送給他的。在那個艱難的年代，我們真象離開娘的孩子，對娘給留下的一點東西，愛如珠寶。

孩子終於生下來了，華亭那蒼白的臉上，連一點血色都沒有，她睜開眼睛望了望剛降生的小生命，一陣一陣地出虛汗。

我輕聲地在她耳旁說：“是個男孩。”

華亭把身子移近孩子，臉上露出笑容，左右來回地端詳，興奮和難受使她滴下淚來。接着，她就貪婪地喝着水。

我說：“多喝點，要不就沒有奶了。”

小生命剛一哭，她就將奶頭湊過去，放在孩子紫紅的咀唇上。雖然跟前只有她丈夫和我，但她卻還有些羞澀。我看得出她那初做母親笨手笨腳的樣子，同時也看得出初做母親的那種喜悅。一會，她又把奶頭拿下來，因為還不到下奶的時候，孩子也還不會吃奶。我們把她身旁的草堆高點，擋住帳篷外面吹來的冷風。華亭一連几遍地問我：

“小薛，你看這孩子能活嗎？”

我說：“能活，她不光是你的兒子，也是我們紅軍的、